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文学史系列教材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教程

黄曼君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教程

黄曼君 主编

伍世昭 王本朝 副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教程/黄曼君主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622-4728-9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中国—20 世纪—教材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0765 号

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教程

© 黄曼君 主编

责任编辑:董中锋

责任校对:崔毅然

封面设计:新视点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封面制作:胡 灿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440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4.75

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定价:33.00 元

欢迎举报盗版,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转型(上)	(14)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古典形态	(14)
第二节 世纪之交文学理论批评的过渡性特征	(16)
第三节 五四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勃兴	(20)
第二章 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转型(下)	(25)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兴起和发展	(25)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多元开放局面	(30)
第三章 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总体特征	(37)
第一节 审美的社会价值论观念	(37)
第二节 注重主观选择的理论形态与批评类型	(43)
第三节 趋于科学化的思维方式与概念、范畴系统	(51)
第四节 多元共生、互补交融的“两岸四地”文学理论批评格局	(57)
第四章 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上)	(66)
第一节 社会政治价值取向	(66)
第二节 精神启蒙价值取向	(88)
第五章 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下)	(107)
第一节 审美感悟价值取向	(107)
第二节 语言形式价值取向	(128)
第三节 学理认知价值取向	(146)
第六章 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文体分类批评(上)	(171)
第一节 诗歌理论批评	(171)
第二节 小说理论批评	(189)
第七章 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文体分类批评(下)	(210)
第一节 散文理论批评	(210)

第二节 戏剧理论批评	(226)
第八章 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理论批评	(247)
第一节 台湾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发展与基本特征	(247)
第二节 香港、澳门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发展与重要现象	(270)
第九章 中国 20 世纪通俗文学理论批评	(293)
第一节 通俗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界定	(293)
第二节 通俗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历程(上)	(302)
第三节 通俗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历程(下)	(317)
第四节 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辨析	(330)
第十章 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336)
第一节 中国古今文论特征的比较	(337)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和转换	(342)
第三节 中国 20 世纪文论的回归与创新	(350)
第十一章 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	(359)
第一节 中西文论的比较	(359)
第二节 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与转换	(368)
第三节 中国文论的“西化”特征	(378)
后 记	(388)

绪 论

这本教程打破近代、现代、当代分离的格局,基于中国 20 世纪文学的整体概念,从客观的视野和新的历史镜角,编写与阐释中国 20 世纪,即从戊戌变法前后的文学改良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运动将近一百年的文学理论批评。下面从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整体概念的宏观视野,就方法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作为本书的“绪论”。

一、审美的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性文学理论批评

从性质上看,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存在着或者偏于政治化、或者偏于现代化、或者偏于审美化的多种模式,但从世纪整体的根本规定性来看,特别是从文学理论批评的实际运作来看,这几种模式往往是以综合形态出现并发挥着整体效应的。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在现代和传统、外国和本土的胶合点上出现的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从根本性质上看应该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论批评。

我们知道,文学理论批评史和其研究对象的文学一样,从根本性质上说,是一种高高地“耸立”和“浮悬”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一种特殊的审美化的意识形态。“近百年”或“20 世纪”的“史”的整体概念的提出,也与这一根本性质有着密切关系。由于文学理论批评观念与文学观念紧密联系,受文学观念影响、制约,又更富有科学理论体系性质,因而较之于文学和文学观念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但同时,文学理论批评毕竟是以具有审美特性的文学作为对象依据的,批评主体必须有深刻而敏锐的审美体验能力,因此,文学理论批评又必然与文学一样从根本上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的性质。以特定阶段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批评家、批评类型、批评流派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批评史,既离不开社会历史生活的发展,又离不开文学本身的发展,因此它必然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后,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使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包括文艺在内的各意识形态领域都发生了或慢或快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进程从近代一直持续到今天。因此,在这一中国

历史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革进程中,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宏观视野出发,将文学理论批评史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概念来研究,正是符合唯物史观的要求的。这里,所谓“整体发展”的概念应该怎样理解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应该从文学或文学理论批评的本体性质的考察着眼。我们知道,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文学,不只是与意识形态的某个门类或某几个门类发生关系,而是与整个意识形态发生关系,其中包括政治、哲学、历史、社会、审美等。在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中,政治是重要的中介,抹杀或忽视这个中介都是错误的;但政治不是唯一的中介。文学既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交互作用的社会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对这个社会总体系进行整体反映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如果说文化既包括了人类的精神活动又包括了物质活动的话,那么,文学既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对文化进行整体反映的一种特殊形式。与文学的这种特点相适应,文学理论批评也与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发生关系。它是一种文化活动,它的生活过程涵盖着整体文化,而不只是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而存在;它又是一种艺术活动,理论批评家必须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审美体验和情感,并把握住作家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和感受方式,从而激发自己内心的创造力,通过艺术内形式的中介作用融合非审美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进入作品中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整体内涵。以这样的文学理论批评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便必然具有“整体发展”的特征,从而成为以人类基本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为终极动力的、着眼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整体,以审美心理结构为内形式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基于上述理解就可以知道,一则不能将“史”的观念限制在过短、过细的时空范围内,因为这样做不容易清楚地探究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现象和文学理论批评家的源流关系;再则不能将文学理论批评仅仅依附于政治或其他某个意识形态部门,因为这样做,要么容易将“史”的分期标准完全依附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划分,造成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政治史化的倾向,要么仅将文学理论批评看成是文学活动的自然延伸,造成文学理论批评史独特学科体系的庞杂和混乱。因此,只有既在横向联结上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生活的根本特征,从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多方面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又从纵向发展上着眼于从近代到当代的历史发展全过程,才能从“整体发展”上很好地揭示和总结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规律和经验。例如,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由古代到现代的转轨和发展就要看到这种“整体发展”的特点。大家知道,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文以载道”、“以文学为道学的附庸”的经邦济世的文学观念一直贯穿始终,与之相适应,文学批评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尚实用、少思辨、重微观、轻宏观、重直觉、疏理性的特征,在批评类型上则

存在着重教化、重人伦的实用批评,重点悟、重体验的印象批评等。而要实现文学观念的变革,揭破批评模式的板块,产生新的批评格局,就必须一方面猛烈抨击和批判旧的既成的文学观念、批评观念和种种规范,另一方面实现批评观念、类型、方法的多方面转换和建设。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这种最活跃、最丰富的历史转折时期,应该说正是从20世纪初的近代“启动”到以五四文学革命达到“起飞”的临界线的。近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和“曲界革命”等口号中贯穿着求新、求变、求用的近代意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①等长篇文学理论批评论文的出现,以新颖的理论构架、系统周详的论述、科学分析的方式冲决了传统文论的藩篱,打破了陈旧的规范,开拓出新天地,显示出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面目。从此以后,与社会政治、现实人生的文学观念相一致,对民族救亡与社会革命具有实践意义的价值论文学理论批评观念一直占着主导地位,相应地,把文学视为反映生活的镜子,在文学活动中注重重大政治问题和历史事件,注重传达时代主旋律的社会环境还原批评的类型、流派和方法也一直是主要的,或为数最多的。这在近代、现代和当代都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从文学活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活动的整体内涵看,从文学的审美特征看,也就是说,从心理学、社会学、美学、语言学、文化学、神话学等多角度看,近百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又存在着认识论、本体论、表现论、价值论多种批评观念和对文学各领域有特定切入角度的社会文化批评、作家批评、文学实体批评、读者接受批评等。虽然在文学理论批评的科学化、多元化和批评本体自省方面不像西方那样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文化四个方面有着独特、系统的建构和发展,而是大多与价值论批评观念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联系,但文学理论批评在主导倾向鲜明情况下的多元化现象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是存在着的,它们都包含着对文学本体构成某一方面的合规律的认识,从而从自己的角度不同程度地丰富和发展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

从现代阐释的史的观念看,历史的发展还有着回环反复的特点。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他认为,人类哲学认识的发展,经历着由偏到全、由低到高的近似螺旋式曲线的发展。他把这比喻为一串圆圈组成的大圆圈。对于文学理论批评史,着眼于“近百年”或“20世纪”的总体过程,较之于近代、现代、当代分离的格局,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圆圈,并对这种“圆圈”进行整体审视,从而更

^① 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

好地总结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例如,在近代就有重政治实用(如梁启超)、重主观表现(如鲁迅)、重文学本体(如王国维)三种不同的批评观念。五四以后,在以现实主义为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种文学思潮交错推动和影响之下,重现实政治、时代人生,重自我表现、主体创造以及重文学实体的构成和显现等批评观念、类型和模式,又显然是近代三个基本格局的重复和发展。20 世纪 30 年代,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批评本身初步融合了社会环境还原批评、作家主体批评和文学实体批评的诸多优点,而同时前述几种批评观念、类型、方法仍然多元存在和发展着。还要看到,以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思想和美学的历史的文学理论原则为构架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在 20 世纪 40 年代至 80 年代与中国文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又在重复回环中呈现出各种变异形态:或被赋予更充分的民族形式的特点,或主张文学应揭示深广的现实的历史的内涵,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而形成新的文艺规范,或被简单化、庸俗化并成为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工具。直至社会主义新时期,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调整之后又在理论和实践上赋予它们以新颖的辩证内涵。这种批评观念螺旋式“圆圈”的发展,只有以宏观的眼光着眼于整个历史时代的全过程,才更便于揭示其中的规律。从文学理论批评的概念、范畴看,这种“圆圈式”的发展也是常见的。例如,王国维初步融合了中西文论的观点,使传统诗歌理论以“意境说”的新面貌出现;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对西方“典型论”的认同,“意境说”又有了创造性转换的“现代调整”;而社会主义新时期,在西方现代主义象征派、意象派、表现主义等观点和方法的影响和渗入下,又经过传统的“意境说”与中国现代典型理论两种因素的交融,更创造了以朦胧多义为特征的新的意境理论。又例如,由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主观之诗人”,提出“重内美”、“造境”的概念,到鲁迅的“大胆地,深入地,真诚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重主观态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后又有胡风关于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一系列有独特内涵的概念、范畴;新时期更有强调文学主体性及许多新的概念、范畴的出现。这些概念、范畴的承接、借用、融汇和变通,显然也是一个圆圈式的发展。着眼于中国“近百年”或“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总体过程,还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直至如今,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范畴体系。而我们知道,语言体式、概念、范畴以及与之相对应并紧密联结着的价值尺度、思维方式、思维结构等,正是一门学科是否建立理论体系、成为一门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除少数文学理论批评家如王国维、鲁迅、沈雁冰、郭沫若、宗白华、胡风、毛泽东等创造出了一些自己独有的又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批评概念、范畴以外,总的来说,或者搬用西方的(这是多数),或者承袭中国传统

的(这是少数),少有能够通过独特的概念、范畴体系对文学理论批评进行理论概括,同时,以政治判断性的概念、范畴取代文艺美学、文学理论独特的概念、范畴的现象非常突出。这种情况表明,与20世纪中国文学在创作方面的突出成就相比,对文论的独特研究,包括理论上的建设,都十分不足。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列文论指引下如何使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的类型、流派的多样化发展结合起来,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多种学科结合起来,形成相应的多种文学理论批评类型、流派、方法,这是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课题。而上述经验教训的总结、规律的探索,不从宏观上着眼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学理论批评过程,是不容易得到充分的论证的。

二、文学理论批评现代品格的确立及现代化、民族化的双向进程

既有着广阔的外国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参照系,又有着本民族文学和文论传统的深入到内质的承传关系,立足于“近百年”或“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潮流和文论的实际,凝结着历史发展与横向联结的双重内容,这种宏观视野和总体格局也体现出一种新的价值判断,一种新的阐释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是在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转折、变化的条件下,在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的、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新文学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地接受了外国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批评观念、类型、流派、方法的影响,在宏大的、传统的和外国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参照系统之中所形成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向外国思潮、外国文学理论批评大幅度开放,以之为参照系,并将自身置于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学理论批评总体格局的这一历史进程,从近代开始直到现在仍在继续。鲁迅说:“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旧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其中就包括“文艺之业”^①。这种“参与世界的事业”,向世界开放、变革图新的紧迫感,可以说是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在“文艺之业”中,也包括近百年的文学理论批评。

我国文学理论批评近代品格的确立,由古代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进程正是深受西方影响、参与世界文艺之业的结果。这里,重要的问题是,要通过中西的比较,弄清西方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近代品格确立的历史背景和内容特征。我们认为,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近代品格的确立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古典主义理论形成之时,与欧洲思想史上自康德开始的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的大转折分不开。在浪漫主义运动以前的时代,同封建制度、神权统治相对立的是人

^① 鲁迅:《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的“类”的要求,人的整体概念,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基督教上帝偶像的依然存在,理性至上、理性逻辑之思至上的情形也是那个时代思想的特征。浪漫主义时代则大不相同。这个时代的思想不仅将个体、自我与人的“类”的概念对立起来,而且将心灵、精神与理性至上对立起来。将个体、自我、心灵、精神放在首要地位的结果,是人的个体存在方式的探求、主体精神的觉醒和高扬。文学理论批评近代品格的确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批评家自我主体精神的觉醒和高扬。这是文学理论批评摆脱古代思者、诗人、先知三者朴素统合的标志,也是文学理论批评摆脱对于文学创作的依附,在自省与创造中使自身趋于独立的内驱力。有一种看法,将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近代品格的确立提前到 14 世纪、15 世纪文艺复兴初期,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则将其意识的自觉提前到魏晋时期。这种观点只看到文学理论批评独立于创作的一个方面,却未能从思想史的总体上看到与个性主义思想相对应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个性意识的独立、主体精神的发扬的更根本之点。根据上述认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近代品格的确立,也应该是在戊戌变法后西方人文哲学思想,特别是以个性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浪漫思潮传入中国的时候开始的。虽然在近代,包括戊戌变法以后一段时间,人的理论主要是宏扬国民群体意识,个体意识被淹没在国民群体意识之中。梁启超等人以及“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运动所表现的文学理论批评观点,大多以为改良主义服务的政治实用功利观为宗旨。但是当时代思潮八面袭来,向西方思潮大幅度开放,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主动选择的姿态“参与世界事业”的形势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已明显地出现了真正近代意义的转折。如王国维的“欲者不观,观者不欲”的纯艺术的根本观点以及用悲观主义对《红楼梦》所作的富于创造性的评价,正是接受了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诗化哲学的影响的结果。康德对于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把具有无概念、非功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特征的美学、诗学看成是实现人的个体自由的精神科学领域。叔本华更把本体看成是一种盲目的、不可遏止的冲动,一种非理性的存在,直截了当地说“世界是我的表象”。他还从唯意志论出发,导出了悲观主义人生观。这些观点都直接影响到王国维,使他能以体现了个性自由的美的观点作为评价作品的价值尺度。鲁迅当时受到西方 19 世纪浪漫主义“摩罗”诗派和 20 世纪人本主义“新神思宗”的影响,提出了“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①的浪漫诗学总命题。他的浪漫诗学与西方浪漫诗学具有一些共同的思想特征。这就是对“最理想的人性”^②的人的自然状态非常向往,并看到文明、科技、大工业带来的人性“偏至”的

①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46 页。

②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年,第 20 页。

现象,即扼杀“个性之尊严”,舍弃“主观之内面精神”、“美上之感情”等,而纠正的办法是“非物质,重个人”,将主观精神和美上感情提到极高的地位上,这样“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方能“人各有己,群之大觉近矣”^①,达到“立人”、“立国”的目的。这种将“个人”、“灵明”放在首位的浪漫思路表现在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上,就是强调文学主体的精神力量,强调个性的真率不羁,强调情感的自由表现。还要看到,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不只是运用哲学、美学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介绍、阐释、评价从而引申出文学理论批评观点,而且对文学理论批评本身进行了自觉的反思,进入到了批评自省的境地。运用西方文学观点,基于“自心发之,亦以心受之”的对文学特殊规律的认识,对文学的概念,即文学的含义和本质特征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释和界定。不仅如此,正如论文题目所示,还针对“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进行了辨析,即对诸多阐释文学本体的批评观点,如视“文章为经世之业”、“耿介于程器”等观点进行了批判和探讨。此外,梁启超、鲁迅、王国维等人也都发表过对中国历来及当时文论的批评和论述。要注意到,虽然我国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以理论批评实践作为反思的材料,文学批评成为独立的反思对象的情形是存在着的,但是,在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美学思潮影响下,以文学理论批评家批评个性和文学观念的近代意义的觉醒为前提,这在中国还是首次。上面之所以较多地谈到戊戌变法后文学理论批评的状况,是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中西文化、文学思潮冲撞、交汇下,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近代品格才开始确立,这个转折期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五四时期,在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种文学思潮、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同时输入中国并对中国新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发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无论是批评观念在自省中趋于多样化,或是批评类型的多侧面深化、批评流派的形成等,都表明了文学理论批评自觉意识的增强。20世纪30年代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介绍到中国并开始与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实际结合起来。这里,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人的理论上的富于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重大发展。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像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那样背弃人文主义、启蒙主义传统,它不否定人的个体价值和个性自由的意义,不否定人的精神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和超越作用,相信有创造意识和超越意义的人改变着时代和社会的面貌正是它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不像人文主义、启蒙主义那样对人盲目自信,不像德国古典哲学、浪漫派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36页。

那样扩张和夸大自我的作用。它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现实性活动,不脱离历史具体的人类物质生产的客观规定性,因而人的主体性不是随心所欲的唯意志论,而要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从而还人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基于上述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理论的观点,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应该是具有全方位思维视野的文学理论批评意识的,即在文学活动与生活世界、文学活动与创作主体、文学活动与实体世界、文学活动与读者世界四组对应关系上展示出认识论、表现论、实体论、价值论等多种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同时也应该有多种批评类型、流派和方法的发展。要看到的是,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和多方面的理论批评实践,上述最优化的理论批评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批评充分发挥了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它不仅使文学理论批评从社会政治倾向性的角度去要求、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而且使文学理论批评在与意识形态的“对话”中获得充实、发展自己,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但上述处于主导地位的理论批评模式在运用和实践中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文学理论批评几乎完全以苏俄作为参照系,缺乏向西方近现代多种批评观念和批评形态开放的广阔的理论视野。与此相联系,又出现了如下问题,即用哲学上的反映论来代替创作论,用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取代诸如文化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等多种研究方法,用对单个作家作品的具体体验性批评来取代将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史三者结合起来的宏观体验性批评等。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经过向西方多方面的借鉴和立足于中国现实和传统的求索和选择,文学理论批评在观念、类型、方法上出现了从单一到多样、从单向到多向、从单个作家作品评论到具有历史感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的趋势。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文学理论批评多样发展的格局中又出现了淡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最优化批评模式的情形。文艺领域中出现了一股“为人类而艺术”、“为自我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文学理论批评也出现了用抽象的人性、人的生命本能、非理性化的个体主观表现,标榜艺术独立、玩文学等批评观点来取代社会的历史的价值论批评观点的局面。因此,如何“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努力发展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继续提倡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术艺术观点的争鸣”^①,这对于发展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同样有着重要意义。

以上所勾勒叙述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在西方思潮影响下的现代化历

^① 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31 页。

程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现实政治、文化历史,从中国文学思潮、文学理论批评实际出发的现代化和民族化双向选择的历程。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一历程,再进一步看看中国近百年或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是如何构筑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现实的历史的民族文学基点,是有必要的。

首先,从与 19 世纪近代西方的关系看,中国近百年在文学理论批评的观念、类型和方法上主要是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文学理论批评为参照系并接受了它们的影响的。但对于西方的这种影响不仅不是简单的重复,而且有许多变异和创获。西方现实主义在实证哲学的影响下很强调客观地、逼真地再现人生图画,其理论批评也很强调社会文化环境的还原批评,但我国在接受西方现实主义的影响时,则注重注入主观态度,强调现实战斗精神。且不说我国近代与“为政治”、“为人生”、“为艺术”三种文学观念相对应的文学理论批评就表现出批评主体相当强烈的主观性,从而呈现出价值论和表现论批评观念的特征;从五四时期的情形来看,鲁迅的现实主义更融合了现实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和在《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中所倡导的浪漫诗学精神,因而他在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上既注重文学对人生图画“具象化”的逼真描写,又强调主观思想的渗透力、情感的真实和“深切”的“表现”。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理论批评也既主张实地观察、精细再现,又强调政治功利和主观情感。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现实主义更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学说结合起来,与美学的历史的文学理论批评原则结合起来,因而在批评观念类型、标准尺度、功能任务、方法手段上都与西方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显出不同的特点。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因此而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独特体系,又与我国古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批评有某种内在的精神联系。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事而不重自然,有着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因而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既注重揭示作者的性情和作品中丰富多彩的人生,又注重作为审美主体的批评家和读者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发明”性质。所谓“诗言志”的文学观念,就是注重文学作品表现政治伦理道德和揭示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基于这种文学观念,就有“以意立志”、“知人论世”和“以性论诗”、“以人品论诗”的批评原则的出现。这种批评原则从作品看,注重表现风俗世态,揭示政治伦理;从作家看,注重直觉顿悟整体把握的方式。而这些,无论在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上,还是在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运思方式以及批评类型、方法上,都对中国近百年将社会学演绎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学理论批评发生着内在影响。

其次,从与 20 世纪现代西方的关系看,西方 20 世纪在进入所谓“批评时代”以后的批评观念、类型、方法等对中国也有影响,但在总体批评格局的历史演变

上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这也体现出立足本民族基点的民族化与现代化双向选择的特征。我们知道,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众多学科结合,产生出众多的流派,主要有作者、作品、读者与社会文化四个系统。它们总的特点是,打破传统的哲学统合、本体建设等批评的统一格局而呈现出多元分途发展的局面。从批评意识上看,它们常用演绎的方法率先建构模式,强化批评类型和模式的辐射力和整饬作用,解析作品时甚至摒弃了对作品的价值判断;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看,它们的总的倾向是重形式,轻内容。这样,便在语言结构、精神分析、集体无意识、文艺阐释、社会文化等方面超越文艺作品的广阔范围内形成以科学分析为特征的多元批评的格局。我国文学理论批评从近代起就受到上述批评某些方面的影响。特别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批评类型的深化、批评流派的形成显然与借鉴和参照西方 20 世纪文论有关。但在我国,这四种批评类型没有各自得到充分的发展,文学理论批评大多明确地被赋予意识形态的使命,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各种批评类型所作的统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批评形态。在批评意识上,不是从学术思潮、学科形态的角度切入文学领域,而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进行演绎,进入作品,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以内容为重。崇尚内容决定形式。从五四前后的一般的社会功利价值观到 20 世纪 30 年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类型,从 20 世纪 40 年代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原则的结合到新时期马列主义指导下多种文艺理论批评原则、类型的发展,这一从近代到当代的理论批评历程正充分显示了上述占主导地位的批评倾向。

三、批评形态的分离互补与思、诗、史的辩证关系

将文学理论、文学评论与文学史三者互补交融,打破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三个部门的分类,处理好思、诗、史三者的关系,这是体现文学理论批评史观现代化特征的又一突出表现。而“近百年”或“20 世纪”文学的整体概念有利于加强上述三者关系互补、交融的趋向,更能鲜明地体现阐释的文学史观的特征。

应该看到,将文学批评分为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史三个门类,这是从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基于批评主体的个性觉醒而使文学批评走向自觉、反省时开始的。它打破了古代文学批评依附于文学创作、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部门(如哲学、历史)的局面,因而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一个大的发展和进步。然而,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开始,这三者又呈现出自觉地互补、融合的趋势。思与诗的对话、思与史的对话的现象明显地增强。西方从柏拉图直至近代,几乎绵延到整个 19 世纪,思想史上主要是“思”与科学、宗教(非原宗教的上帝,而是科学理性所制造的僵死的上帝)的对话,少有思与诗、思与史的对话。长时期以来,在思与

诗的关系上,“诗”被划入非思的领域,“思”也被划入非诗的领域,诗之“思性”和思之“诗性”都被遮蔽起来。西方史学从修昔底德到19世纪初的兰克,也延至几乎整个19世纪,“史”被划入非思的范畴,“思”也被划入非史的范畴,“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重视因果规律,避免价值判断和意义阐释,主张如实直书的叙事体的史学。思与诗、思与史的分离推向极端,思只承认科学认知经验和宗教认知经验,于是,思愈来愈“纯粹理性”化、“哲学化”。滥觞于康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宗教没落,科学式微,“纯粹理性”受到扬弃。西方现代思想开始了“诗性转向”,思的对话由科学、宗教转而为“诗”,诗学成为一种重建价值、重新解释人生的新的文明、新的生存方式、新的文化。而作为诗学这种自由意志产物的复写品的历史学,也不是过去仅凭史料和因果规律起作用的领域,而进入了有着自由意志的精神科学的领域。史学领域里的新康德主义者和“年鉴派”兴起以后,以“结构的历史”代替“事件的历史”,重视理论分析,主张历史知识在考虑任何事件时都要参照价值体系,提出“没有理论就没有史学”(“年鉴派”口号),历史是对客观历史的具有理论负荷和价值负荷的重构。现代阐释学在表达这种观念时更有特色,他们将历史看成是提出问题、应答问题和重构问题的过程。而对问题的应答和重构不是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用先在的理论观点揭示因果联系,而是主张通过历史叙述弄清事件前后左右的联系。例如德国的阐释学家汉斯·伽达默尔说:“对问题的确定是通向知的道路”^①,“提问意味着进入敞开”^②,“每一叙述都必须被看作是对于一个问题的反应……为了把握问题,我们不能从一种背后动机的网络入手,相反地,倒是应该搞清意义(它为问题所包含,并且沉淀在叙述之中)的更加广泛的前后关系”^③。“人们的历史行为是对某一问题的应答,只有当我们重构这一问题时,我们才会理解历史的事件”^④,“世界历史将被作为问题史来理解”^⑤。正是这样,西方思想史由于思与诗、思与史对话的结果,产生了向诗之思、史之思的转向。由上所述,可见从时空观的整体概念出发,运用“长时程”

① [德]汉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英译本),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28页。

② [德]汉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英译本),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26页。

③ [德]汉斯·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93页。

④ [德]汉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英译本),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28页。

⑤ [德]汉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英译本),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

的观念看问题,就可以知道,思想史上思、诗、史互补、交融的现象是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诗性转向中新型的诗学时代分不开的。用这种“长时程”的宏观整体概念来看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史三个文学批评门类由三个概念的分化、独立,到彼此间互补、交融,不是一种单纯的批评门类或文化演变现象,而是与西方追求新的人的存在方式、新的文明、新的人生出路的总体格局分不开的。

从上述 20 世纪思想史上的新格局和新精神来看,在思、诗、史三者的关系,或相应的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史三者的关系上,虽然早已脱去了“纯粹思性”之思的羁绊,然而,与诗和史相交融的“思”——哲学、文艺美学以及其他多种学科的理论观点仍然是起关键作用的。例如,在进行文学评论时,也就是从当前时代精神和审美要求出发阐释、分析、评价当代作家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时,如果注重思想和理论的指引和渗透,就会更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如果放置在文学史的潮流中进行勾勒和评价,就会在史的整体格局中具有丰富的参照对象和对文学时代的价值论、意义论的沉思。在撰写文学史时,也就是将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当作历史过程进行叙述和阐释时,也才会因为思与史的结合,而具有科学性和明确性的理论范畴和原则,具有当今历史时代的思想 and 理论高度,从而使文学史成为一种选择体系,一种具有理论负荷和价值负荷的阐释的文学史。所以,我以为,世界思想进入诗学时代,在思与诗、思与史的对话中有了诗之思、史之思的新局面,有了文学理论、文学评论与文学史互补、交融的新局面,这正是文学史或文学理论批评史作为精神科学而显出现代性特征的突出表现。如果说,西方 20 世纪众多批评流派虽然在作者、作品、读者、社会文化几个方面各有独特见解和某一方面的突破,但表现出批评方法、原则对批评对象的肢解、吞噬,从而在批评手段、目的等问题上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弊端,那么,西方还有另一些文学理论批评家则与上述诸流派的批评家不同。例如,雷纳·韦勒克就不像各批评派别中以“专”见长的许多人,他是既博且专。他撰写的六卷本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将哲学思考、社会价值论和学术探讨融为一体,在统合、理解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现象上具有明显的优越于仅从单方面发展、突破的形形色色批评家。正是这位韦勒克,特别重视思和诗、思和史的结合,重视历史主义与当代阐释的结合。他说他撰写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之所以以近代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 30 年代这个时期为发端,是因为这个时期是新古典主义批评的庞大体系趋于解体,而浪漫主义运动种种新动向竞相涌现的时期,这是“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现今依然尚未解决的批评上的所有基本问题的时期”。他还谈到,他撰写这部文学理论批评史,一方面是为了从近二百年西方文学批评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本身的价值来探本寻源”;另一方面,也是要通过理论批评规律的总结和诸多